

摒弃唯升学率的政绩观

□ 熊丙奇

针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规定,健全作业管理办法,统筹调控作业量和作业时间;严控考试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有媒体援引相关负责人的话指出,《指南》将着力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3月22日《光明日报》)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办学存在较为严重的应试倾向,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存在的唯升学率的政绩导向。要扭转义务教育的应试导向,首要的就是扭转地方政府的唯升学率的政绩导向。

在任何国家,学生在高中毕业后,都面临升学与就业的问题。不过,像我国这样的基础教育面临巨大应试压力,以及学校在组织教学中的升学导向如此强烈的,似乎并不多。这与相关管理

部门对学校办学的评价体系有密切关系。比如,在日韩,高考竞争虽然也异常激烈,但中小学给学生开设的课程是相对完整的,体育等课程也不存在被边缘化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升学是学生的选择,学校的职责只是给学生这一求学阶段提供高质量的、完整的教育。

以学校的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其实是与政府举办教育的职责背离的。政府作为教育举办者,重要的职责是办好各类教育、学校,若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办学,就必然出现强化某类教育、学校,歧视其他类教育、学校的问题,还会影响学生在就业与升学之间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发展面向所有学生的教育制造障碍。

政府部门的关注点由升学率转为学校开设课程及完成课程教学的情况,系依法治教。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依法按“五育并举”的要求保障教育投入以及监

督学校依法办学。至于学校如何办学,应该把自主权交给学校;办学质量如何,也应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价;教师教得如何,应由教师共同体评价。简言之,就是要切实推进国家一直在强调的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这是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教育政绩观,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关键。

为研制《指南》,有关方面重点搜集整理并研究分析了1555份中央与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我国先后已发布1000多份文件,不可谓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落实与推进之难。持续推进问题解决,必须在关键点上寻求突破。从长远看,我国必须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明确政府发展教育的基本职责,形成科学的教育政绩观。而就当前看,则有必要建立教育问责机制,对违反减负规定、纵容违规办学的地方政府严肃问责,不能让规定只停留在文件上。

银保监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通知指出,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和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进行诱导性营销,发放针对在校大学生的互联网消费贷款,引诱大学生过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

(3月19日《广州日报》)

一个行业被点名、被“罚站”,并非无缘无故。我们来看看大量小额贷款公司纷纷涌向大学校园、争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的隐性危害有多大。一方面,互联网借贷大门洞开,将大学生消费欲望这只“猛虎”放出笼子,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成风,而现实并不允许他们“撒野”,因为多数人还是要靠父母供养。

另一方面,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不是雪中送炭的慈善家,而是乘人之危的阴谋家。大学阶段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因为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陷入借贷泥沼而惶惶不可终日,多么不应该。对此,监管部门能够坐视不理吗?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治理,宜疏堵结合。堵,要堵得牢、堵得死。因为小额贷款公司“本领大”,会“七十二变”,总能依据相关监管要求变出新花样来。监管部门要有见招拆招、蛇打七寸的功夫,不给无良小额贷款公司变身的机会。

疏,要疏得巧、疏得通。针对现实情况,银保监会在通知中也提到了,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开发针对性、差异化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遵循小额、短期、风险可控的原则,严格限制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和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总业务规模。在审慎原则下推进相关业务,既能满足大学生的部分需求,又做到风险可控,不失为上策。

家长“指导”教学逾越了家校边界

□ 郑桂灵

这几年,高学历家长越来越多,他们多有顺利且成功的求学历程,大多积累下了成熟、成体系的学习经验。据最新一期《半月谈》报道,一些高学历家长将自己的经验和观念“套用”到孩子的校园教育中,点评和质疑教师授课内容,俨然成为学校教育的“编外教师”。这让学校的一些教师陷入困惑:家长总来指导教学,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

(3月18日《北京青年报》)

家长变身“编外教师”,误导和扭曲了“家校共育”理念,非但不利于建立良好家校关系,还会徒增家长、教师、学生的三方焦虑。家长对日常教学场外“指点”,极大消解了教师的课堂权威,也让孩子对待课堂的态度更为随意,甚至会以父母对老师的质疑作为自己不认真听讲的借口。而且,“七嘴八舌”的家长争议,极易导致教师执教莫衷一是甚至“乱了阵脚”,尤其是对于年轻教师,更会挫伤教学自信,改变教育初心,影响教改创新。久而久之,便会陷入茫然、困惑和消沉心态。家长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与监督,但不意味着家校教育可以混为一谈。各方应该厘清各自职能边界,为学校教育留有自主教学“空间”。

报考『教资』只为多一条职业后路吗

□ 任冠青

这两年,考教师资格证成为不少人的“真香”选择。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达410万人,到2019年则攀升至900万人。今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日当天,网络讨论热度更是直接将#教资#词条送上微博热搜。

(3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与“教资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教师岗位的意外“爆冷”。在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职业排行中,中小学教师首次上榜。热衷于考“教资”的人,似乎并不都是为了当老师,而是抱着“多一种选择”的态度,给自己默默铺着职业“后路”。

但是,对个人而言,哪里热往哪里挤、随波逐流考证的倾向则未免太过盲目。不少热衷于“收集”证书的人认为,

技多不压身,证书越多越能给自己带来奋斗的充实感和未来的安全感。然而很多时候,埋头考证更多是在制造一种“自己很努力”的假象,也是对当下事业瓶颈和困境的逃避。

很多时候,人在对当下职业境况感到不满时,常常会不自觉地给其他行业加上一层“美好滤镜”。比如,在很多热衷于考“教资”的人看来,老师就意味着“旱涝保收”“到点下班”“不用操心”。殊不知,要想真正做好教育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

从掌握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性格特点,到摸索出科学高效的教学方法,教育事业需要不断用心灌溉。如果只是抱着对教师行业的美好想象,缺乏“传道授业解惑”的热情和耐心,那么即便最终入行,也难以真正做好这份事业,对教育 and 自我而言都是一种耽误。

职场生涯中,人最重要的是做到“认识自己”。与其随波逐流考证,为自己铺设可能根本就不会起步的“跑道”,还不如穿过迷雾直面内心,作出更加理性务实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选择。

盲盒营销,别盯上孩子



近日媒体报道,在一些连锁文具店或文化用品店内都能买到笔、橡皮、笔记本等各类文具盲盒。它们价格5元到30元不等,成为中小学生的时下新宠。不止于此,当下市场上流行的卡片盲盒、图书盲盒等,均锁定青少年人群。作为潮流文化的新形式,盲盒消费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容易令人沉迷。单次购买盲盒价格并不昂贵,然而一旦成瘾,开销不少。盲盒营销已经带来诸多乱象,若是打起青少年的主意,这样的生意经就念歪了。

王铎

师范院校应有“师范味”

□ 林莺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在去年两会上提的“关于加快推进师范院校‘再师范化’的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应。教育部称,在教师教育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众多师范院校选择走综合化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在提升实力的同时,也出现了“去师范化”的现象。

(3月17日《浙江教育报》)

师范院校不能少了“师范味”。首先,这是师范院校本身的职责所决定的。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教师教育将由办学模式改革向培养模式改革深化,普通师范院校是面向基础教育、专

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机构。这一职责决定了师范院校必须坚守“师范味”。其次,这也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需要。“德高为师,身正为范。”高等师范学校应以培养合格的中小学师资为己任。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师范院校的重任,是其办学的指导思想。

师范院校少了“师范味”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此,政府和教育部应当正视现实,尽快构建新型师范院校评估体系,凸显和侧重教师培养质量,把立德树人、教学能力、教育实践等作为教师培养质量评估的核心内容,真正彰显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的优势。